



从离散到团圆

湖南人民出版社

从离散到团圆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长沙

从离散到团圆

编号：(湘)2763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壹号)

长沙市展览馆路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25/16印张 44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09·864 定价：(5)0.18元

前 言

这里选編了十个从离散到团圓的故事。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故事，而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訴和对新社会的热情贊歌；这不仅是十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情景，而且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在旧社会里，飽受剝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有多少个家庭，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害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請看，《佳节会亲人》这一故事的作者李显紅同志，他的家在旧社会里是个什么样子：弟弟和妹妹被餓死了；母亲被地主、劣紳逼着卖了还債；父亲被地主害死了；最后只剩下年幼的李显紅，也逃不出敌人的魔掌，被他們卖給了別人。再看看《海底捞針》这个故事：何蓮真原来是一个“吹鼓手”的女儿，在旧社会里一連被逼卖了三次，头一次是被父亲用土車子推着到长沙城里卖掉的。解放以后，长沙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在为她寻找亲人的过程中，竟发现解放前有四个“吹鼓手”用土車子推着女儿卖到了长沙城里！可見，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是有着多么悲惨的共同命运！

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了身，作了主，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其中許多家庭，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已經找到了过去离散了多年的亲人。有些人年紀很小就同家人离散了，有的人甚至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离开了亲生父亲，他們和自己的亲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地址，或者不清楚对方的姓名，他們要找到自己的亲人，真象是“海底捞針”一样。然而，在党和阶级兄弟的关怀下，终于捞起了“海底的針”。《海底捞針》这

个故事，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人民公安干部周少云同志，想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怀着对阶级姐妹的无限深情，就一连跑了五个县市、六十三个机关、十五个公社、七十二个大队、一百四十二个生产队、七十一条街道、三十六条船只，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何莲真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

讀着这些故事，两个社会，两种遭遇，对比是这样鲜明，使我们不能不更加愤恨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不为劳动人民在新社会的幸福而欢欣，更不能不被我们党和人民的干部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劳动人民翻了身，生活过得越来越美好，但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灭亡。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就正在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企图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国；它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唆使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我们劳动人民，能够容许敌人再来剥削、压迫我们，使我们回到旧社会那种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深渊里去么？不，我们绝对不能答应！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斗争到底！让我们看了这些故事，更加牢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的苦难，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化为巨大的革命力量！

編 者

一九六五年七月

目 录

前言.....	(1)
“海底撈針”.....	(1)
遺女寻亲.....	(15)
兄妹悲欢.....	(22)
母子团圓記.....	(29)
五姓兄弟.....	(33)
三个母亲的故事.....	(39)
我終於找到了亲爹.....	(46)
生平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亲爹.....	(52)
团圓.....	(58)
佳节会亲人.....	(64)

“海底撈針”

——公安干部周少云帮助何蓮真找到亲人的故事

彭香林 譚國材

“炭耙子街”和“蕩巴子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长沙市西区公安分局，接到由市公安局轉来湖北省沔阳县胡家場区公所赵宗德同志一封来信。信中說到，他母亲叫范长珥，現年五十六岁，老家住在长沙市南門蕩巴子街二十四号。范长珥的父亲是个海員工人，但不知道他叫范（也許姓万）什么名字。她老人家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記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当时范家很苦，她只記得自己是在十三岁的时候被父亲卖掉的。至今不知亲人下落。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她不知流过多少伤心的眼泪。今天翻身了，她要求公安部門想方設法帮助她找到亲人。分局同志象对待所有的群众来信一样，認真地研究了这封来信，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給周少云去完成。

周少云接受了这项任务，把信看了又看，眼前的綫索仅有个“蕩巴子街”、“姓范（万）”的“海員工人”。可是，“蕩巴子街”在哪里呢？他在长沙作了十来年的公安工作，就是沒听說有什么“蕩巴子街”，問其他同志也不知道。后来，老周想起了自

已在二十多年前來長沙做木工的時候，曾經聽說南門附近有一條“炭耙子街”，後來改名叫學院街了。是不是“炭耙子街”就是“蕩巴子街”呢？於是，他來到學院街訪問。老人們都笑着回答：“同志，半百年的事了，誰還記得啊！”有的老人說：“不錯，原來這裡叫‘炭耙子街’，不叫‘蕩巴子街’。可是，那條‘炭耙子街’，在解放前先後被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鬼子放火燒得一干二淨，原來住在這條街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現在到哪裡去查這些事情哪！”老周反復地思考着，他想：只有深入到群眾中去，訪問有沒有過去在“炭耙子街”住過的老住戶。為了找老住戶，每天，他早出晚歸，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也不休息，不辭勞苦地訪問了學院街附近的南牆灣、修文街、文廟坪、黎家坡、豆豉園、半湘街等街巷的上百個老居民。但是，事情仍然茫無頭緒。

老海員的回憶

老周並沒有灰心喪氣。他又在姓范和姓萬的海員工人的綫索上想了很多辦法。首先，他來到市公安局，在市局同志的協助下，從全市八十萬人口的戶籍卡中把姓范姓萬的名字、住址都抄了出來，根據年齡、職業，一個一個地查訪。但是沒有結果。接着，他又來到長沙港務局找綫索。港務局的同志們熱情地同老周一起，把全局幹部和海員中姓范和姓萬的以及姓顏、姓阮的人的名字、住址都抄下來了。這些人的住址遍及全市各個角落，老周一個一個地訪問了，然而，希望又成了泡影。老周曾經在水上派出所工作過一段時間，他想：訪問水上船民也許能夠找到一點綫索。於是，他除訪問了好些本港船隻以外，還

訪問了从常德、益阳、双峯、宁乡、湘潭、衡阳以及湖北来的外港船三十六只。这样，也还是没有結果。这时，长沙港务局的同志又对老周說：“你再去訪問那些已經退休了的老海員看看，也許能弄出点名堂。”老周又根据港务局同志提供的退休老海員名单，进行了紧张而艰苦細致的查訪工作。他从这家走到那家，一連走訪了几十家退休老海員，还是没有着落。在退休老海員中沒有找到綫索，他又来到了省交通厅內河航运管理局查訪。管理局人事保卫科的同志热情协助老周查閱了省内河各港口的姓范姓万的海員名册和档案，仍沒有找出一点头緒。但是，他們向老周提供了一个重要綫索，要他去找“活档案”——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共产党员、七十多岁的老海員工人范德发同志。

一个星期天，老周来到了范老的家里。范德发这个在旧社会受了一輩子苦的老海員工人，听老周說明来意以后，深深地为赵家阶级姐妹的遭遇和今天的人民公安干部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动。他回忆往事，禁不住老泪纵横，向周少云訴說了自己过去骨肉分离的一段辛酸血泪史：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日本鬼子侵入了长沙。就在日本鬼子侵犯长沙的那年，范老带着他的爱人和儿女往广西桂林逃难。当逃到金城江的时候，全家被冲散了。范老急得没有办法，只好跑到伪警察局去請求代寻亲人。那些如狼似虎的伪警察，凶神恶煞地对范老說：“你带了多少錢？沒有錢誰替你去找亲人！”范老还想再說几句，不料几个大耳光早已落在他的脸上了，接着就是几脚、几槍托子，把他赶出了伪警察局



的大門。解放以後，搭幫毛主席的領導好，人民公安幹部幫他把那過去失散的子女找到了，可是他的妻子，一直到現在還下落不明。談起這段苦情，范老無限激動地對老周說：“舊社會使人妻離子散，偽警察只顧敲詐勒索欺壓人民，只有毛主席領導下的公安幹部才這樣關心人民群众的痛苦！新舊社會，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最後，當話題轉到趙宗德的母親找親人一事的時候，范老說：“就是沒聽說過‘炭耙子街’有姓范的海員賣過女兒這回事。”

老周從范老家里回來，思想很不寧靜。一方面，范老和許許多多老海員在舊社會的種種遭遇，使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階級教育；另一方面，这次助人寻亲人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线索一个一个地断了头，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再找嗎？任务又没有完成。怎么办呢？他很苦恼。这时，有人劝他：“写封信答复对方：‘查无此人’。你已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样答复人家，总不能說是不負責任吧！”老周带着矛盾的心情，向分局领导同志和党支部汇报請示，领导上肯定了他前段工作的成績，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领导同志对他說：“写封‘查无此人’的回信，这倒容易，提笔就可以写成。但是我們作为一个人民的公安人員，能够这样去对待人民群众的嘱托嗎？……”最后，领导上給他出了一个点子：赶快写封信給赵宗德，請他母亲尽可能地再提供一些新情况和一点一滴的线索。

新的“蛛絲馬迹”

不几天，赵宗德回信了，提供了如下新情况和线索：

他母亲的老家不是在长沙南門蕩巴子街，而是住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庄（具体地名記不清），住的屋是一个剪刀形的茅草棚子，屋后有小山，山上有毛栗子树。她亲生父亲姓何（也許姓賀，記不得名字了），是个吹鼓手。过去，她家里穷得揭不开鍋盖，母亲被迫帮别人做‘女仆’。后来家里又被盜，几件破烂东西也被偷得精光。父亲实在养不活女儿，在一天清早太阳沒有出山的时候，用土車子把她（当时还只有八岁）推往长沙市南門蕩巴子街，給一个姓范的海員工人做养女。从此，她便改名换姓叫做范长珥。当时范家也很穷，到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

范家父母忽然把她送到了火車上，賣給漢口一個人販子。不到一年，這個人販子又把她轉賣了一次。後來聽說又要轉賣給別人，她就逃跑了。從此，她就過着討米度日的生活。後來不久，在漢口碰上了姓趙的“叫化子”伯伯，他見她可憐，就收留做童養媳，她才正式有了個家。解放以後，全家生活得很幸福……。

分局領導和周少雲讀完這封信，一種強烈的階級同情心使他們久久不能平靜。他們仿佛親眼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這姓何的一家，掙扎在死亡綫上，也好象同他一家老小正在經受着那生離死別痛苦的煎熬，更仿佛聽到趙宗德之母在夢中呼喚亲人的聲音。

“我們一定要幫助階級姐妹找到亲人，而且越快越好。”分局領導堅定地說。接着他們又反復分析、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法：把目標轉移到市郊去，找“姓何（賀）”的“吹鼓手”。分局領導鼓勵老周說：“儘管她這次提供的新綫索很籠統，但是，任何蛛絲馬迹，對於我們公安人員來說，已經是寬敞的大道了。”最後，局長特別意味深長地启发老周：“我們要把階級姐妹的忧愁當作我們自己的忧愁，你自己過去不是也曾經經歷過悲離的痛苦嗎！……”

一根苦藤上結的瓜

當天晚上，老周百感交集，特別是局長最後的幾句話，真象針一樣刺到了他的痛處。他躺在床上翻來復去，辛酸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展現。

周少雲出身於一個貧農家里。在他出生後的一個月零七

天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死得很悲惨。当时，周少云的父亲在一个资本家家里做长工，得了急病，到快要死的时候，万恶的资本家不但见死不救，反而怕他死在他家里，就把病人拖到门外。就这样，周少云的父亲死在街边上了，死后还是用草席子包了埋的。到现在，周少云还不知道父亲埋在什么地方。父亲死了，母亲带着他到处讨米度日。他两岁的时候，母亲被迫改嫁了，从此他成了孤儿。十一岁那年，他跟着继父学木匠。有一年，附近一家姓黄的地主要周少云给他做棺材，周少云同地主顶了几句嘴，那地主便暴跳如雷，举手要打。周少云逃走了，可是那万恶的地主说：“在我黄家的天底下面，看你逃到哪里去！”果然，不久的一天，周少云被那家伙揪住了，挨了狠狠的两扁担，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直到现在，周少云的头上还留下两条深深的伤疤）。然而，那地主并没有死心，又勾结伪保长，要抓周少云去当壮丁。老周被迫离开母亲，来到了长沙市一个资本家家里当木工。在这里，他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是几天几晚也说不完的……。

他想着想着，摸摸头上的伤疤，胸中燃起了一团团对旧社会仇恨的怒火。他不禁自言自语起来：“我不能松气，一定要帮助阶级姐妹找到亲人，我和她都是一根苦藤上结的瓜呀！”

毛主席著作的启示

第二天，老周就去郊区雨花亭、黑石渡一带查访。接着，又到长沙县的东山、干杉树等地查访。访问了几十个“吹鼓手”，都被否定了。但是，在这些访问的过程中，有好些老“吹鼓手”

熱情地向他提供了許多線索。這些線索，伸展到了長沙市、株洲市的郊區和長沙、湘潭、瀏陽等縣的農村。他根據這些線索，首先到了湘潭的易家灣和長沙市郊的暮雲市查訪，都無結果。

轉眼間，已是一九六四年的春節。機關規定有三天假期。正當人們熱熱鬧鬧和家人團聚的時候，老周卻騎着自行車又到長沙縣的農村訪問去了。當時，狂風卷着雨雪，大地冰封。老周不顧這些，冒着風霜雨雪，跋山涉水，吃苦耐勞，踏遍了南托、石門、洞井、大托鋪、跳馬、團然等六個公社的王力坪、克家沖、木家塢等地方，訪問了許多姓何、姓賀的“吹鼓手”。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二月分又快完了，尋找工作已整整進行了四個月。隨着時間的消逝，老周的心也一天一天地

緊張起來。啊，希望還是渺渺茫茫！這時，他產生了急躁情緒。他想：“這怕真的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地方訪問了那麼多個，‘吹鼓手’也訪問了不少的人，就是沒有找到我要找的人。”他急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安。領導上看透了他的心思，說：“是不是工作真的做到家了呢？是不是真的已經山窮水盡了呢？你



不是經常說要讀毛主席的書，听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如果你想半途而廢，這能算毛主席的好戰士嗎？”並且建議他再好好地讀讀毛主席的書。

深夜了，老周坐在燈光下，翻開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文章，一遍又一遍地讀着。毛主席說：“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热忱。……”毛主席又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讀着讀着，思想豁然開朗了。他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人民的利益工作作到了‘極端’負責任嗎？達到‘徹底’的標準了嗎？象我這樣半途而廢的思想，哪里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呢？……”

毛主席的指示，給了他巨大的力量。第二天，他又繼續開始了尋找工作。他跑到哪里，就向哪里的社員群眾作宣傳，哪里的黨組織和社員群眾就向他伸出熱情支援之手。一天，他來到長沙縣團然公社訪問，公社黨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大會。黨委書記知道老周的來意以後，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且在幹部大會上號召大家為尋找自己的階級姐妹貢獻一分力量。晚上，老周拿了全社十多本戶口冊，把所有姓何、姓賀的“吹鼓手”名字都抄了下來，然後根據年齡等情況一一查對。有的當時被否定了，有的第二天由隊幹部帶領他一家家地查訪，也被否定了。又有一天，他在瀏陽縣柏加公社訪問，當離開老屋頭村，走了約兩里路的時候，後面追來了兩個小學生。他們邊追邊喊道：“同志，請你打轉來。我家來了個黃家大爺，有急事找你！”

老周急忙轉身來到老屋頭大屋，村子里站滿了社員群眾，其中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貧農老社員黃甫林——他住在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是聞訊特地趕來報告線索的——，激動地對老周說：“我過去有個吹喇叭的舅舅，家里很窮，生了四個女兒養不活，先後都送給別人去了。大女和二女現在住在長沙市郊左家塘和東屯渡，三女和四女現在還下落不明。三女是用土車子送到城里去的……。”老周非常感謝黃家大爺。於是，他的足跡又踏遍了長沙市郊的東屯渡、左家塘以及瀏陽縣的駱家沖，株洲市郊雲田公社的龍頭等地方。事情雖然沒有進展，但是，老周卻深深地為各地黨組織和社員群眾熱情的支持所感動。

三家認親

冬去春來，這時已經是三月底了，尋找工作開展了整整五個月了。也就是在這幾個月當中，許多地方的社員群眾都把周少雲幫別人找親人的事情傳開了。因此，有許多人前來向分局提供情況和報告線索。這裡出現了三家認親的故事。

第一家是長沙縣大托公社大托大隊貧農社員賀樹明。他來到分局要認親，說他有個姑母是祖父用土車子送到長沙城去去的，一直到現在還下落不明。幾十年來，祖母都哭着那送走了的女兒。特別是賀樹明的在株洲某工廠工作的妹妹，聞訊後特地請假趕來分局，硬說趙宗德的母親是她的姑母，要求分局去信要姑母回來見面。她還說：“如果她不是我姑母，那也不要緊，天下窮人是一家，她來了，我家決不會輕待她。”

第二家前來認親的是瀏陽縣柏加公社何園大隊貧農社員

何运兴。他說：“我祖父叫何受福，是个‘吹鼓手’，过去家里穷，后来又被盜过一次。就在被盜的第三天清早太阳沒出山的时候，祖父用土車子把自己的女儿推到长沙城里送給別人去了。听说你們在帮助一个姓赵的寻找亲人，那肯定是我的姑母了……。”

第三家認亲的是株洲市郊区龙头鋪公社太平大队貧农女社員何桂元。她来信說：“我父亲名何晓庭，年七十四岁（已死），母亲何文氏（已死），生有六女二崽。原住株洲市郊中西塘灣（离长沙八十多里），住的是一栋人字形的烂茅屋，屋后有山，到秋天山上有毛栗子摘。过去我家很穷，父亲曾經是个‘吹鼓手’。有一年約在五月間一个晚上，家中被盜得精光。过了两天，父亲用土車子推着我一个七八岁的蓮姐姐（她排行第三，記不清名字了），送到长沙市南門一家人家去了。也就在这一年，我母亲被迫到长沙一个資本家家里喂奶汁去了。一九五八年母亲临死时，还口口声声喊：‘蓮妹子，你在哪里？’……。”

与此同时，太平大队党支部也来了一封信，詳細介紹了何晓庭过去家中的情况和送女一事的細節，并且随信寄来了何文氏和她的二女何秀英的两张照片，要求公安部門查証。

奇怪呀奇怪，这三家的情况竟然如此相同，找亲人的心如此迫切。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的命运是相同的，多少父母忍痛卖儿送女是迫不得已的啊！分局领导和周少云認真地分析研究了这三家的情况。最后，分局领导指示周少云：集中精力对这三家进行調查。周少云根据这个指示，首先訪問了长沙县的賀澍明家和浏阳县的何运兴家。經